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列寧到馬克思：論馬克思的共產思想及其與列寧的關聯性

From Lenin to Marx: Reflections on Marx's Communist Thought and Its Relation to Lenin's

doi:10.6523/168451532002090002001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2), 2002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2), 2002

作者/Author : 陳宜中(I-Chung Chen)

頁數/Page : 1-4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523/168451532002090002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2期 2002年9月 頁1-46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No. 2, September 2002, pp. 1-46

從列寧到馬克思： 論馬克思的共產思想及其與列寧的關聯性 *

陳宜中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From Lenin to Marx:
Reflections on Marx's Communist Thought and its
Relation to Lenin's

by

I-Chung Ch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林毓生院士所主持的「公民社會基本政治社會觀念研究」計畫的第一次研討會（2002年3月22、23日，中研院社科所），作者感謝評論人孫善豪教授的建議和指正。本文的三位審查人提供了不少寶貴的修正意見，使初稿中的疏失得以更正，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2年6月7日；通過日期2002年7月14日

摘要

馬克思與列寧之間的思想傳承關係何在，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在過去七、八十年間累積了汗牛充棟的相關討論與文獻。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廣被認為是促成二十世紀馬列主義極權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是，人們不免進一步追問：在馬克思的思想裡，是否有些、或有哪些特殊成份，可以視為是促成列寧主義乃至於馬列主義的思想要因？本文以「從列寧到馬克思」為題，嘗試針對馬克思共產革命思想裡與列寧主義最具關聯性的面向進行分析和批評。作者認為，列寧繼承並且發展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思想裡的一些重要質素，尤其是國家終結、政治終結、超越布爾喬亞民主、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科學的社會主義等主張。職是，批評列寧主義、批評列寧，也就等於是對馬恩在這些方面的議論進行反思和批評，而也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區辨出馬恩思想中的合理成份以及那些不盡合理的成份。

關鍵詞：馬克思、列寧、國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一、前言

馬克思與列寧之間的思想傳承關係何在，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一個複雜的思想史課題，在過去七、八十年間累積了汗牛充棟的相關討論與文獻。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廣被認為是促成二十世紀馬列主義極權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是，人們不免進一步追問：在馬克思的思想裡，是否有些、或有哪些特殊成份，可以視為是促成列寧主義乃至於馬列主義的思想要因？

在近代學術界，這類型的問題意識所在多有，例如韋伯關於資本主義興起之思想文化成因的討論。這類提問所關切的是某種思想或思想要素的非意欲性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何在，或更精確地說，某種後果或事務狀態是否有些重要的思想成因。同樣地，我們可以追問：馬列政權的興起是否有些重要的思想成因？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否有些重要的思想成因？在列寧的政經思想與馬克思的共產思想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聯繫（connections）？以下是兩個重要的線索。

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幾乎可以說是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主張，而回顧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馬克思與恩格斯毫無疑問是其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在十九世紀，對私有制提出批評的社會主義者所在多有，而對自由市場提出批評的社會主義者也不在少數，但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主張全盤取消市場機制、並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而代之的論者，卻可以說是少之又少。準此，馬恩乃至列寧的全盤反市場思想，實可謂是二十世紀遂行公有制計畫經濟的馬列政權的思想根源。

又如，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前，敢於對主張全面摧毀「布爾喬亞民主」的列寧主義提出質疑或挑戰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但自七〇年代末起，不少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對列寧的政治思想提出批評，並且廣泛地肯認其與史達林主義／馬列主義的關聯性。批評列寧的政治思想，當然也就是在對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相關議論進行批評，因為列寧繼承並且發展了馬恩政治思想裡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質素，尤其是「國家終結」、「政治終結」、「超越布爾喬亞民主」等主張。

本文之寫作係由林毓生院士所主持之「公民社會基本政治社會觀念研究」計畫所促成，其目的在於針對馬克思的共產思想及其與列寧的關聯性，提出一些具體的看法。顯而易見，要在一篇文章的篇幅內處理如此龐雜的課題並非易事，也註定會招來「過度簡化」之質疑。然而，本文並非蓋棺論定之作，僅嘗試初步地釐清問題的主要脈絡和線索。

此外，儘管本文以「從列寧到馬克思」為題，但討論的重心仍在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思想。我認為馬恩的「共產主義論述」毫無疑問是列寧的幾項主要政經主張（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市場與私有制、國家終結、政治終結、布爾喬亞民主終結）的思想根源。時至今日，批判早已垮台或名存實亡的馬列政權、批判列寧主義、批判列寧都是十分容易的事，但我們仍必須更進一步對列寧主義的思想根源（即馬恩的共產革命思想）提出質疑，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區辨出馬恩思想中的合理成份（如對資本主義經濟下的社會極化趨勢進行分析和批判）以及那些不盡合理的成份。

本文後續各節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二節首先說明本文問題意識的由來。在第三節裡，我將敘述馬克思共產思想的兩個重要面向，一是

他把共產社會描繪成是一個所有異化、壓迫與宰制關係不復存在、使得人類獲致真正解放與自由的完善社會，另則是他強調此種共產社會的到來乃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所趨。第四節則進一步敘述馬克思對共產革命的一些刻劃，尤其是他在黨的角色、革命進程、革命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國家該如何終結等問題上的議論。在第五節裡，我將概述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政經主張，並指出其與馬恩共產思想的關聯性以及分歧之處。第六節則進一步敘述列寧對馬恩共產思想的發展。在第七節裡，我將歸納出幾點初步結論，並嘗試申述其現實意義。

二、問題的由來

從一八四〇年代到一八七〇年代，馬克思的思想體系逐漸發展成形，而自一八七〇年代末起，恩格斯開始嘗試以更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表述馬克思的思想重點，突顯其與各種其他社會主義思潮之差異，以使其變成一種支持者眾的政治信仰。在恩格斯的奔走努力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並促成了第二國際（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在一八八九年之創立。第二國際集結了歐洲各主要社會民主政黨，並以馬克思主義為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義扮演了整合歐洲社會民主運動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力主政經改革，另方面強調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趨勢，並樂觀地相信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到來。從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成立）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國際瓦解）的這段期間，咸認為是歐洲馬克思主義思想及運動的黃金時期。¹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在民族問題上猶豫不決的第二國際頓時全盤瓦解，也使得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開始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以後見之明，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的瓦解可以說是代表著一個馬克思主義時代的終結，而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十月革命的意外成功，則代表著另一個馬克思主義時代的來臨。在這兩種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不少共同的堅持，但也有許多顯著而且重要的差異。

在俄羅斯奪權成功的列寧（V. I. Lenin）一夕間成了家喻戶曉的革命領袖，而列寧主義（Leninism）也逐漸從馬克思主義內部的路線爭議中脫穎而出。革命英雄列寧想當然爾地被當成是馬克思主義的救星，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統繼承人，而蘇聯則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祖國。自一九二〇年代起，蘇聯共產黨開始收編西方世界殘餘的馬克思主義勢力，並嘗試擴張其在落後地區（如中國）的影響力。隨著史達林（J. V. Stalin）的上台，新成立的各國共產黨也逐漸喪失了自主性，在組織方式和意識型態上唯蘇聯馬首是瞻，或甚至聽任莫斯科的擺佈。

一九二四年，列寧的接班人史達林首創了「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一詞。對內為了整肅異己，對外為了擴大蘇聯的國際影響力，史達林以馬克思和列寧的繼承人自居，並發明出「馬列主義」以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後來，在史達林成功掌權後，「馬列主義」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正式變成了蘇共官方的意識型態教條。二次戰後陸續出現的東歐、中國、北韓、古巴、越南等共產政權，皆奉馬列主義為官方意識型態，在推動公有制計畫經濟的同時，並強調共產黨是科學真理的化身以及共產黨一黨專政之必要，以正當化諸如政治

¹ 對照 Kolakowski (1978, vol.2) 論第二國際。

迫害、領袖崇拜、灌輸教條等行徑。這些專制做法可以說是馬克思、恩格斯和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幾無可能接受的，而事實上，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共產社會的預期，主要是就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係建立在「先進資本主義文明已耗盡其進步潛力」此項基本假設之上，所以不曾料想到馬克思主義竟然會變成落後國家追求經濟發展、民族解放、國家發展、反帝反殖民、超英趕美的一種工具。

基於馬恩及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與列寧、史達林、毛澤東之間的重要差異，我們當然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二十世紀的史達林主義／馬列主義現象歸咎於馬克思與恩格斯，或甚至把馬恩思想與所謂的「極權主義」混為一談。但另一方面，我們仍可以合理地追問：在馬克思的思想裡，是否有些、或有哪些特殊成份，稱得上是促成列寧主義乃至於馬列主義的思想要因？

三、馬克思的共產烏托邦

馬克思除了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思潮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批判者外，也同時是位共產主義思想家，並且向來強調他本人的共產思想與其他各股社會／共產主義思潮之差異。在這一節裡，我將敘述馬克思共產思想的兩個重要面向。首先，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刻劃的共產社會裡，所有的異化、宰制與壓迫關係都將不復存在，而這不僅意味著私有制、階級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終結，還意味著宗教、政治、國家、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意識型態、商品生產、金錢、市場之終結與超越。此外，馬克思相信此種共產社會的到來乃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大勢所趨。他斷言歷史／資本主義的發展終將催生出

一個革命無產階級，並將使宗教、政治、國家、代議民主、意識型態、商品生產、金錢、市場等各種異化關係喪失其存在之基礎，而終為共產社會所取代。

以上是我所謂馬恩共產革命思想的兩個重要面向。這些基本想法在馬克思的著作裡有其堅實的文本基礎，也為晚年恩格斯所強調，並且在他們身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 青年馬克思論異化之超越

一八四三年，青年馬克思寫成了兩篇極具代表性的文字，〈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與〈論猶太問題〉，分別對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以及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進行批評。在黑格爾的筆下，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一個各種特殊利益不斷傾軋的場域，而憲政國家則被理論化成某種「普遍國家」。對此，馬克思的主要批評是，表面上訴諸普遍利益的憲政國家其實不夠普遍，其普遍性是虛幻的、想像出來的、名不符實的，因為只要市民社會裡的壓迫關係持續存在，國家的「政治」（=特殊、壓迫、宰制）性格就會持續存在。馬克思樂觀地相信，隨著普遍選舉權（「民主」）的確立，市民社會將得以透過選票，顛覆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藩籬。有朝一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對立將被超越而不復存在，國家將從此終結，政治從此終結，壓迫與宰制從此終結，人與人之間、人與其類本質（species being）之間的異化關係從此終結，而終使人類獲致真正的解放與自由。²

² 見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收錄於 Marx (MECW, 3; MEW)，另摘錄於 Marx (EPW)、McLellan (1977) 和 Tucker (1978)。另參見 Avineri (1968) 和 Colletti (1975) 論馬克思的國家終結、政治終結、以及超越國家／

在一八四〇年代，普遍選舉權仍是一項頗為激進的訴求，因為布爾喬亞以及多數自由派知識份子在獲得了選票後，一反其人人平等的口號，反對賦予弱勢階級平等的選舉權。馬克思終其一生是普遍選舉權的支持者，不過，他對於普遍選舉權（「民主」）的理解，與自由主義之間存在著某些根本的差異。對馬克思而言，普遍選舉權的真正意義在於超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對立，在於異化之超越，所以他強調支持普遍選舉權並不等於支持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馬克思認為代議民主乃是建立在「代表者」與「被代表者」這組異化關係上的一種政治制度，而必須為某種「真民主」(true democracy)所取代。在此，所謂的「真民主」必須從其否定面來了解，意味著超越異化、超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³

在一八四三年的另一篇文字〈論猶太問題〉裡，馬克思指出自由主義者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等主張，雖具一定的進步性，但所代表的不過是一種政治解放而非人類解放。自由主義式的政治解放雖使國家獲致形式上的普遍性（如宗教自由、政教分離），但真正的人類解放則有賴於進一步消除市民社會裡的異化關係。馬克思認為，自由主義者口中的「公民權」（尤指政治權）與「人權」其實是兩種性質不同、互相衝突的權利，前者使人與人之間透過公民身份連結成一個共同體，後者則使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互相競爭、自私自利，而他認為這是有待超越的一種異化關係。⁴

從一八四四年的《經濟與哲學手稿》起，馬克思開始對私有制、

市民社會之二元對立等主張。關於馬克思的異化終結論，另參見 Wood (1981)。

³ 參見 Marx (MECW, 3, pp.30, 120-1) 論「真民主」。

⁴ 見馬克思的〈論猶太問題〉，收錄於 Marx (MEW; EPW)、 McLellan (1977) 和 Tucker (1978)。

金錢及市場關係進行批判，並且清楚地把他的立場界定成是一種「共產主義」。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代表著真正的人類解放與自由，以及人與人之間、人與其本質之間異化關係之超越。⁵ 至於被他點到名的、有待超越的異化關係，則包括了國家、政治、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宗教（一八四三年起），私有制、金錢及市場（一八四四年起），意識型態（一八四五、四六年《德意志意識型態》起）和商品拜物教（出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和《資本論》）。⁶

（二）國家終結、政治終結、超越布爾喬亞民主

在前述清單之中，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首先是馬克思的「國家終結」、「政治終結」以及「超越自由民主」等主張。這些主張不斷出現在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裡，而其最主要的論點如下。

首先，馬克思認為國家「唯能以政治國家（the political state）的型態存在」，而根據我的理解，這意味著國家必然是一種「政治」（= 壓迫、宰制）的機器（MECW, 3: 118）。由於共產主義是對所有壓迫與宰制關係的超越，所以「政治終結」與「國家終結」乃是共產社會的必要條件。

⁵ 參見 Marx (MECW, 3, esp.p.296) 論共產主義代表異化之超越。見馬克思的《經濟與哲學手稿》，收錄於 Marx (MECW, 3; MEW) 和 Tucker (1978)，另摘錄於 McLellan (1977)。關於馬克思對私有制、金錢及市場關係之全面性批判，另參見 Selucky (1979)、Walicki (1995)、Moore (1993) 和 McNally (1993) 的相關討論。

⁶ 關於馬克思的意識型態終結論及對商品拜物教之批判，參見陳宜中(2000)的討論。《德意志意識型態》收錄於 Marx (MECW, 5)。關於《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和《資本論》，見 Marx (G; MECW, 35; C3)。

馬恩宣稱，在共產社會裡，「公權力（public power）將失去其政治性格」，並且「將不再有所謂的政治權力，因為政治權力正是市民社會裡對立關係的表現」（MECW, 6: 505, 212）。在政治（權力）終結的同時，國家也一起終結，因為國家（＝政治國家）必然是一種政治權力。但在政治與國家終結之後，某種失去了政治性格、因此不能稱為國家的「公權力」仍將存在。至於這種不是國家的「公權力」究竟該如何行使、如何規範、如何防止其淪為壓迫與宰制的機器，馬克思與恩格斯（據我了解）從未提供過任何具體的看法，彷彿在他們所定義的政治與國家終結之後，公權力的行使就不再是個問題。我認為這是馬恩政治／國家終結論述的一大盲點，並將在第四節裡提供進一步說明。

其次，馬恩認為國家之所以從市民社會裡異化出來，乃是由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所導致。⁷ 國家的政治性格因此必須從分工體制的階段性發展去掌握，而要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尤其必須扣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階級關係及其政治經濟面。在一八四〇年代後期的著作裡（如《德意志意識型態》、《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馬恩特別強調布爾喬亞或資本主義國家乃是一種階級壓迫的工具（參見 MECW, 5: 355），但在他們更後期的著作裡（如馬克思的《資本論》），則出現了「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法則掌握資本主義國家之性質」的談法。⁸ 前者是一種帶有所謂「階級化約論」色彩的談法，後者則趨近於一種所謂的「經濟決定論」。兩者皆是本質主

⁷ 關於這點，見 Marx and Engels (MECW, 5, pp.46-7)、Marx (MECW, 24, p.96) 及 Engels (MECW, 26, p.269)，分別出現在《德意志意識型態》、《哥達綱領批判》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⁸ 參見 esp. Marx (C3, p.791)。

義式的分析，分別從「階級」與「政治經濟」這兩種角度去掌握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本質。但無論資本主義國家所服膺的是階級邏輯還是資本邏輯，馬恩的一項重要堅持是：國家／政治將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終結而終結（後續討論請見第四節）。

與馬恩國家終結、政治終結思想密切相關的是「超越布爾喬亞民主」之主張。儘管馬恩不否認有這種民主制度的國家要比起沒有這種制度的威權國家來得進步，但他們強調這種制度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壓迫與宰制的政治機器，也同樣必須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和政治經濟面去掌握。值得注意的是，「超越布爾喬亞民主」與馬恩對普遍選舉權的有條件支持並不相衝突，因為對他們來說，縱使無產階級在某些情況下（指自由民主制度較發達的國家）可以透過普遍選舉權的行使來取得權力，但這既不表示議會體制外的革命鬥爭毫無必要，也不意味著革命之後仍將保留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據我了解，馬克思從一八四三年開始，即堅定地認為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乃是建立在「代表者」與「被代表者」這組異化關係上的一種制度，而必須為共產社會所超越，並且始終未曾改變此項基本看法。⁹ 另一個重要的例證是晚年恩格斯所採取的立場。當時，恩格斯樂觀地相信德國社民黨將有機會靠著選票取得權力，但儘管如此，他特別強調這絕不意味著支持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並曾經因此而教訓他的學生考茨基（Karl Kautsky），因為考茨基把恩格斯硬說成是代議民主的擁護者。¹⁰

⁹ 另參見第四節關於馬克思一八七一年〈法國內戰〉一文的相關討論。

¹⁰ Tucker (1978, p.556) 引述了恩格斯教訓考茨基的話。這段話因列寧的大肆宣傳而廣為人知。

(三) 馬克思的全盤反市場思想

在「政治終結」、「國家終結」、「超越布爾喬亞民主」等主張之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全盤反市場思想。在本文前言，我曾經指出，「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私有制與市場」乃是馬恩以降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主張（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而回顧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馬恩毫無疑問是此項主張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

馬恩不僅十分自覺地主張共產社會應全面取消金錢與市場，並且大力批判不同意此一立場的社會主義者。在青年馬克思的著作如《經濟與哲學手稿》裡，馬克思即已頗為清楚地表達出了他的全盤反市場思想。在《德意志意識型態》裡，他與恩格斯更進一步嘗試說明為什麼市場關係終將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終結而終結。馬恩表示，私有制與市場的物質基礎是分工體系，而分工體系的階段性發展係由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所決定。分工的程度與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有著亦步亦趨的關係，而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社會）分工的體系也日益複雜，而這正是「世界市場」之所以逐漸形成的原因（MECW, 5: 32, 49, 87）。然而，馬恩預言，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將催生出一個具有共產意識的無產階級，後者終將徹底「消滅」（abolish）私有制、市場與（社會）分工，而「使得供需關係之權力化為烏有，使得人類再次獲得對交換、生產的控制」（MECW, 5: 51, 48）。

依我之見，前述說法存在著一個潛在的問題。問題在於，按照馬恩的說法，世界市場的物質基礎在於高度複雜的（社會）分工，而分工的程度係由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所決定。換句話說，生產力的發展程

度愈高，分工的程度也就愈高。準此，我們其實可以和考茨基一樣（見第五節），得出一個與馬恩完全相反的結論，也就是主張市場機制與社會分工體系有其客觀的存在基礎，而不會因為任何人或任何階級的主觀意志而有所移轉，除非我們真的想要回到生產力低落的前資本主義社會。

雖然馬恩堅定相信市場關係終將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終結而終結，但並未堅持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所提出的說法。後來，在馬恩後期的著作裡（尤指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談法，也就是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或社會化趨勢，並推論集中化生產不但將與私有制產生決定性衝突，亦將與市場交換和社會分工體系產生決定性衝突。¹¹ 在《資本論》裡，馬克思用「一個極大的工廠」（one immense factory）來比喻革命後的公有制計畫經濟。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使得資本逐漸集中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裡，而這種發展趨勢使得市場交換逐漸喪失其存在基礎，使得水平的社會分工體系逐漸為大工廠或大公司內部的垂直分工體系所取代（MECW, 35: 362）。公有制計畫經濟的到來，因此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發展之大勢所趨。此項說法後來在恩格斯極具影響力的《反杜林論》裡，獲得了頗為完整的表達，而這正是為什麼「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市場與私有制」會變成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主張。

¹¹ 參見 esp. Marx (MECW, 35, pp.750-1) 以及 Engels (MECW, 24, pp.312-3, 325)。

(四) 共產革命乃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所趨

在十九世紀社會／共產主義思想家的陣營裡，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特別之處不僅僅在於勾勒出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共產社會圖像而已，還在於強調此種社會的到來乃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大勢所趨。馬克思晚期著作《資本論》的重心，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法則及危機趨勢進行「科學的」分析，而恩格斯筆下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即意指社會主義革命乃至於共產社會的到來，正如馬克思的科學分析所顯示的，乃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所趨。這套說法對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有著強烈的吸引力，使得他們樂觀地相信資本主義將要滅亡、社會革命終將來臨。

在一八四〇年代後期的著作裡（如《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型態》、《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以英國為參考座標的階級鬥爭發展觀點以及物質主義史觀（或稱唯物史觀）逐漸發展成形，而其最主要的論點是：階級鬥爭的發展與現代工業的發展有著亦步亦趨的關係。¹² 馬克思強調，階級鬥爭並不是他本人的發明，而早已為布爾喬亞歷史學家們所發現。他的理論貢獻因此不在於發現了階級鬥爭，而在於說明階級鬥爭在歷史過程中的階段性發展，及其發展的動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衝突）和趨勢（共產主義）。在得出了這套歷史理論之後，馬克思開始把他的共產烏托邦看成是歷史發

¹² 《神聖家族》收錄於 Marx (MECW, 4)，《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收錄於 Marx (MECW, 6)。 McLellan (1977) 摘錄了這些重要文獻。關於「階級鬥爭的發展與現代工業的發展有著亦步亦趨的關係」此一基本觀點，參見 Marx (esp. MECW, 6, pp.175, 515)。

展之所趨，而不僅是一己政治理想之表達。¹³

簡單地說，馬克思認為現代工業的不斷發展將使社會逐漸分裂為互相對立的兩個階級，即一小撮掌握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和為數眾多的無產／工人階級，而此種階級極化趨勢終將導致決定性的社會衝突，使得資本主義難以為繼、共產主義水到渠成。按照唯物史觀的專用術語，當「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時，將與實存的「生產關係」發生決定性衝突，從而催生出全面性的社會革命。馬克思相信，生產力高度發達、即將擴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布爾喬亞生產方式，將會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最後一種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世界性發展讓原本不相往來的地方和人群，因市場交換而連結在一起，陷入了普遍的異化關係，但也因此使得全人類的解放與自由成為可能。此外，這種生產方式大幅提升了生產力，而為「按需分配」的共產社會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當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布爾喬亞文明（喻為共產主義的孕母）耗盡其所有進步潛力時，共產革命（喻為在娘胎裡成長茁壯、即將誕生的新生兒）將使全人類獲得解放與自由。人類的前史將就此告終，所有的異化、壓迫、宰制、剝削關係（國家、政治、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宗教、私有制、金錢、市場、社會分

¹³ 見 Marx (MECW, 39, p.63) 論他個人的理論貢獻，以及他在一八五九年的〈序言〉(MECW, 29, pp.263-4) 裡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衝突」之討論。「生產力」(the productive forces) 之概念自《德意志意識型態》起開始出現在馬克思的著作裡，「生產關係」(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之概念則首見於《哲學的貧困》，另參見 Therborn (1976, pp.355-71) 的相關討論，及 Cohen (1978) 對歷史唯物論之現代詮釋。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觀」(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一詞最早出現在一八五九年恩格斯的一篇文章裡 (MECW, 16, p.469)，而「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一詞則是恩格斯 (MESW, 3, p.491; MECW, 27, p.289) 遲至一八九〇年代初才發明的，兩者皆非馬克思本人的用語。

工、意識型態、商品拜物教等等）將從此終結。¹⁴

一八四八年革命過後，歐洲開始進入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承平時期，而馬克思遂投入政治經濟學研究，以期能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法則。對晚期的馬克思而言，階級鬥爭的不斷發展、階級極化的趨勢、乃至於共產革命的到來，仍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認為更重要的任務在於找出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在《資本論》第一冊與第三冊的兩個重要章節裡，馬克思重覆了他在一八四〇年代後期對階級極化趨勢的預言（MECW, 35: 750; C3: 263, 885）。此外，他在一八六七年為《資本論》所寫的一篇序言裡，表示「社會對立的發展程度係由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所決定，這是不容置疑的；更重要的問題因此在於這些法則本身，在於這些有如鐵之必然性、朝向不可避免的結果發展的趨勢本身」（MECW, 35: 9）。對晚期的馬克思來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日俱增之衝突，表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趨勢，例如利潤率的下滑趨勢、以及集中化生產與私有制之衝突，而這些危機趨勢和運動法則有如自然界的規律，可以科學地掌握。¹⁵ 在《資本論》裡，他嘗試科學地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與運動法則，以期說明為什麼共產革命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之所趨。

綜合上述，馬克思除了是資本主義的批判者與分析家外，也同時是位共產主義思想家。在這一節裡，我敘述了馬克思共產思想的兩個特殊面向。首先，共產主義對馬克思與恩格斯而言，代表著所有壓迫與宰制關係的終結與超越，而這不僅意味著私有制、階級及資本主義

¹⁴ 參見《德意志意識型態》（MECW, 5, pp.48-53）、《共產黨宣言》（MECW, 6, pp.485, 490）及〈序言〉（MECW, 29, pp.263-4）。〈序言〉一文亦收錄於 McLellan (1977) 和 Tucker (1978)。

¹⁵ 見 esp. Marx (MECW, 29, pp.133-4; C3, pp.263-4)。

生產方式之終結，還意味著政治、國家、自由主義式的代議民主之終結，以及商品生產、金錢、市場、社會分工之終結。此外，馬恩特別強調共產社會的到來乃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所趨，也就是強調他們的共產思想的「科學」性格，以別於十九世紀的其他各股社會／共產主義思潮。這些看法不僅有其堅實的文本基礎，並且對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產生了多方面的深遠影響。

四、共產革命的政經面向

在這一節裡，我將進一步敘述馬克思對共產革命的一些刻劃，尤其是他在黨的角色、革命進程、革命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國家該如何終結、如何超越布爾喬亞民主等問題上的相關議論。

(一)《共產黨宣言》裡的共產黨

關於黨的角色，首先值得強調的是，馬克思寫作於現代政黨政治才剛萌芽起步的歷史階段，所以既未能預見第二國際時代的政黨政治，更難以想像列寧式的先鋒政黨、史達林式的極權統治這些二十世紀的新興事物。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一方面賦予共產黨人某些積極的政治任務，另方面則強調黨與無產階級之間不存在著領導關係，因為他認為共產黨人不過是無產階級之中較有意識的一群，並未發明出任何教條、原則或意識型態，也不是本於對歷史與資本主義的科學分析，而僅被動地體現或表現出真實的歷史關係，所以稱不上是改變歷史進程的行動者（參見 MECW, 6: 498）。現代政黨的官僚化和

民粹傾向，以及領袖與群眾、領導與服從、黨意與民意、高層與基層之關係等等，皆非馬克思所關心的課題，但卻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關於共產黨人所扮演的角色，馬克思並未在他的晚期著作裡提出更新的說法，直到一八八〇、九〇年代才有一些新觀點在恩格斯的著作裡出現（見第六節的後續討論）。

（二）革命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

關於革命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馬克思表示他不願多做臆測，而必須交由革命者去決定。但儘管如此，他仍提供了一些不成系統、但影響卻極為深遠的「提示」。在上一節裡，我敘述了馬恩的「國家終結」、「政治終結」、「超越布爾喬亞民主」、「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市場與私有制」等主張。以下我將進一步敘述馬恩在這些方面的議論，並指出其潛在問題。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與共產社會之間，會有一段短暫的過渡期或非常時期，可稱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當革命時機成熟時，生產工具已高度集中在極少數資本家的手裡，所以廣大的無產階級可以水到渠成地把這些生產工具國有化，並以計畫性生產取代市場經濟。在短暫的過渡期之後，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將使物資不虞匱乏，而進入按需分配的共產社會。

關於過渡期間的政治體制，在馬克思的著作裡出現了兩種說法。最主要的說法是，如前所述，無產階級在革命後宣佈進入短暫的非常時期，推動公有化及經濟計畫，將權力集中於國家之手。這種說法出現在一八四〇年代的《德意志意識型態》和《共產黨宣言》、六〇年代的《資本論》、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以及恩格斯完成於七八

年的《反杜林論》。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後來變成了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聖經，而前述說法遂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馬克思主義者。¹⁶

然而，推動生產工具國有化與計畫性生產、集權力於一身的無產階級國家要如何才會終結？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chael Bakunin）曾經明確提出過這樣的質疑，而馬克思（於一八七〇年代）的回答則是：當階級統治消失時，當無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在革命後消失時，國家的政治（＝特殊、壓迫、宰制）性格也將隨之消失，所以作為壓迫機器的國家將不復存在。而至於非政治意義下的國家（公權力）和選舉，雖然還會繼續存在，但變成了某種例行事務，而不再容許任何壓迫和宰制（＝政治）的空間。¹⁷ 準此，馬克思一則重申他本人所定義的國家與政治確實會在革命後終結，另則強調此種國家／政治終結觀點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國家立場有所不同。

顯而易見，一八七〇年代的馬克思並未能成功地回答巴枯寧的問題：一個把所有生產工具公有化、遂行計畫性生產的國家（或公權力），如何可能不變成另一種壓迫與宰制的機器？又將如何終結？在上一節裡，我引述了馬恩於一八四〇年代後期的說法：革命之後，「公權力將失去其政治性格」，並且「將不再有所謂的政治權力，因為

¹⁶ 參見《德意志意識型態》（MECW, 5, p.47）、《共產黨宣言》（MECW, 6, p.504）、《資本論》（MECW, 35, pp.356-62, 750-1; C3, 820）、「哥達綱領批判」（MECW, 24, p.95）及《反杜林論》（MECW, 24, pp.312-3）。《哥達綱領批判》亦收錄於 McLellan (1977) 和 Tucker (1978)。《反杜林論》收於 Engels (MECW, 24-25)，Tucker (1978) 摘錄了其中最著名之章節。

¹⁷ 出處是 Marx (MECW, 23, p.175)。另參見馬克思在一八四〇年代關於國家之政治性格的類似說法（MECW, 3, p.118; MECW, 5, pp.46-7; MECW, 6, pp.212, 505）。馬克思回應巴枯寧的文字並未出版，係以筆記的形式寫成，收錄於馬恩全集（MECW）英文版第二十三冊，亦收於 McLellan (1977) 和 Tucker (1978)。

政治權力正是市民社會裡對立關係的表現」。我們不難發現，七〇年代的馬克思依然重複著四〇年代後期「公權力的階級／政治／國家性格將在革命後消失」之論調，而我認為這種說法潛藏著一個很大的盲點。

在馬恩的論述裡，即使是在他們所定義的「政治」與「國家」終結以後，仍然存在著某種失去了政治性格、不能稱為國家的「公權力」。事實上，這正是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如巴枯寧之間，最重要的一項差異。對巴枯寧而言，馬恩筆下在革命之後把所有生產工具公有化、遂行計畫性生產的「公權力」，其實就是一種國家。對馬恩來說，他們所反對的本來就不是公權力，而是帶有政治性格、具備國家（=政治國家）屬性的公權力，所以並無自相矛盾之虞。然而，巴枯寧所提出的是個真問題，而不是假問題。無論是否稱其為國家，馬恩筆下的「公權力」究竟該如何行使、如何規範、如何防止其淪為壓迫與宰制的機器等等，這些都是真問題。但據我了解，馬恩在這些方面幾乎從未提供過任何具體看法，彷彿在革命之後，公權力的行使就不再是個問題。

這是否稱得上是一個嚴重的思想盲點？事實上，即使是在馬恩所身處的時代裡，已有不少論者提出過類似的質疑，但馬恩卻似乎不認為「公權力的行使」是個值得嚴肅思考、認真面對的問題。後來，在《反杜林論》裡，為了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國家思想有所區隔，恩格斯把過渡期間的公權力形容成是一種「正在消失之中（withering away）的國家」，一則暗示公權力並不會在革命之後馬上消失，另則強調這種公權力無論如何將會逐漸消失。至於為何如此，恩格斯並未提供任何解釋（MECW, 24: 321）。這種立場的危險性在於，馬恩在主張生產工具公有化和計畫性生產的同時，完全存而不論公權力的規範

問題。以後見之明，這等於是為列寧開了一張空頭支票（對照第六節）。

關於過渡期間的政治體制，不少評論者認為馬克思還有另外一種相關說法。此種說法短暫地出現在一八七一、七二年間的兩篇文字裡，後來因為列寧的重新闡釋而普獲重視。在七一年的〈法國內戰〉文中，馬克思在反省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經驗的同時，對於某種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體制表達了贊許之意。與前述之過渡模式所不同的是，這是一種主張全面摧毀舊國家機器（而非接收舊國家機器），並以某種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取而代之的過渡模式。¹⁸ 兩者共通之處則是「國家終結」、「政治終結」、「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市場與私有制」等主張。列寧寫成於十月革命前夕的《國家與革命》，即是對此種主張全面摧毀舊國家機器、以直接民主取而代之的過渡模式的一項詮釋。

前述「兩種」過渡模式是否真的可以分為兩種、以及究竟有何不同，向來是馬克思主義者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所爭議的一個焦點。列寧是首先區分出前述「兩種」過渡模式的始作俑者，而他認為，第二國際之所以一敗塗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忘記了馬恩「必須全面摧毀舊國家機器」之提示，而一味地想要奪取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的舊國家機器。作為對馬恩思想的一種詮釋，列寧的說法當然不無問題，因為馬恩關於「必須全面摧毀舊國家機器」之提示僅密集出現在一八七一、七二年。再者，無論馬恩是否主張全面摧毀舊國家機器，他們的立場都與列寧所批判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

¹⁸ 〈法國內戰〉一文收錄於 Marx (MECW, 22) 及 Tucker (1978)，另摘錄於 McLellan (1977)。另一篇相關文字是一八七二年《共產黨宣言》之德文版序言，收錄於 Marx (MECW, 23, p.175) 和 McLellan (1977)。

(見後續兩節)。

值得強調的是，無論到底有沒有兩種過渡模式，「國家終結」、「政治終結」、「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市場與私有制」乃是馬恩不變之主張。前面我所指出的馬恩政經思想的一大盲點，即「在主張生產工具公有化和計畫性生產的同時，完全存而不論公權力的規範問題」，同樣適用於馬恩的「兩種」過渡模式。此一盲點的繼承人不是別人，正是提出兩種過渡模式之說的列寧本人（見第六節）。

(三) 如何超越布爾喬亞民主？

在民主問題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向來是布爾喬亞代議民主制度的批評者，他們不僅認為共產社會應超越布爾喬亞民主，也確實曾對某種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制度表示贊許。

一個潛在的問題是：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是否真能與公有制計畫經濟並行不悖？對此，列寧持肯定的看法，而馬恩亦不認為兩者間存在著原則性的衝突。但我們仍可以追問：所謂的直接民主究竟能夠容許多大程度的「多元」成份？如果多元的決策中心在意見上很不一致，則建立在單一意志之上的公有制計畫經濟勢必窒礙難行；反之，若要推動公有制計畫經濟，則多元主義幾乎無可避免地必須受到壓抑。這不僅是個理論性的推論而已，也是二十世紀馬列主義政權的實際經驗。

對馬恩來說，「多元」並不構成問題，而這是因為他們假設了一個衝突和對立已經不復存在的理想社會。此種社會當然可以容許各種多元的成份，例如張三喜歡釣魚、李四偏好寫小說、王五愛打藍球等等。然而，同樣在此種社會裡，諸如張三主張停止生產牙膏而李四反

對、李四主張禁止色情書刊而王五反對、王五反對墮胎而張三持相反意見等各種多元的「政治」意見以及「政治」衝突，則可以說是主張「政治終結」的馬恩所存而不論的。換句話說，馬恩的共產思想假設了一個徹底「超越」了自由主義者所謂的政治多元、政治自由的「後政治社會」。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前面所提出的問題：在革命之後，公權力究竟該如何行使？如何規範？如果「後政治社會」果真是一項合理的假設，則當然沒有必要討論公權力的規範問題，但此項假設真的合理嗎？

無論革命後的社會所施行的是哪種直接民主制度，馬恩似乎仍有必要回答一些更基本的原則性問題如：在革命之後，政治自由、言論與思想自由是否仍必須予以保障？在與威權專制國家的鬥爭裡，馬恩向來與自由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而他們所憧憬的共產社會乃是對布爾喬亞文明的一種「進步的超越」，而不是非理性的全盤否定。由是觀之，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人對於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或布爾喬亞民主的全盤否定，本難以見容於主張進步、反對威權專制的馬恩思想。不過，馬恩卻也從未能釐清究竟如何才能「進步地超越」布爾喬亞的自由民主制度。根據我的閱讀，馬恩在主張超越布爾喬亞民主的同時，卻似乎從不認為「如何超越布爾喬亞民主？」是個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這再次應證了我先前的說法：馬恩幾乎完全存而不論公權力的規範問題，而這等於是為列寧開了一張空頭支票（對照第六節）。

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相繼去世後，先後出現了原則上主張維持自由民主制度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以及全盤否定自由民主制度的列寧主義。在這兩種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不少共通之處，大者如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信仰以及「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市場與私有

制」之主張。不過，兩者間也存在著一些十分重要的差異。在接下來的兩節裡，我將敘述「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基本政經主張及其與馬恩共產思想的關聯性。

五、第二國際的政經主張

雖然恩格斯向來強調他不過是馬克思思想的仲介者，但若非因為他的奔走努力，馬克思思想也許根本不會變成一種「主義」。對於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馬克思主義的聖經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而不是馬克思的鉅著《資本論》。¹⁹

一八九一年，恩格斯的左右手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考茨基共同為第二國際起草了愛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這份重要文件不僅為恩格斯所首肯，也忠實地呈現出馬克思主義者當時的政治主張。在「改革」方面，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普遍與平等的選舉權、比例代表制、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兩性平權、同工同酬、宗教自由、政教分離、免費的義務教育、免費的訴訟援助、免費的醫療照顧、廢除死刑、累進稅制、八小時工作天、禁止十四歲以下童工從事勞動、改進勞動環境及工作條件等等。此外，恩格斯並要求納入民主共和、聯邦主義等主張。在「革命」方面，馬克思主義者接受了馬恩的唯物史觀以及對資本主義危機趨勢之分析，認為資本將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使得中間階級亦不得不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

¹⁹ 參見 Ryazanov (1927, p.210)、Stedman Jones (1973; 1977) 及 Rigby (1992) 論恩格斯思想之於「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另參見 Carver (1983; 1989) 論馬恩之夥伴關係及恩格斯生平。

而這意味著馬克思所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衝突、或私有制與集中化生產之衝突，已是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終將促成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革命。²⁰

在恩格斯去世後，第二國際內部環繞著改革（短期目標）與革命（終極目標）的爭議很快地浮上了檯面。首先發難的是伯恩斯坦，他主張社會民主人士應務實地以改良主義者自居，而不該對社會主義革命（終極目標）心存幻想，因為他認為馬恩的歷史臆測（如階級極化、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趨勢等等）其實是站不住腳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旋即遭到了來自考茨基和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第二國際正統（orthodox）馬克思主義者的聯合反擊。這場爭議的焦點在於：究竟社會革命的到來是否真如馬恩所言，確實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大勢所趨？修正主義者認為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假科學，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則為馬恩進行辯護。當時，伯恩斯坦廣被認為是這場辯論的輸家，因為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仍堅信馬恩歷史分析的科學性。第二國際雖未因伯恩斯坦的「雜音」而分裂，但修正主義卻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潛流，代表著不少社民黨黨工和基層支持者的心聲。²¹

後來，隨著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在一九〇五年的爆發，第二國際內部又出現了以盧森堡為代表的另外一種聲音，要求社會民主人士認真看待革命的可能性，並採取積極行動（如發動大罷工）以促革命之到

²⁰ 伯恩斯坦與考茨基分別起草了愛爾福特綱領的「改革」與「革命」兩大部分。Kautsky [1892] (1971) 系統地評析了這份綱領，另參見 Kolakowski (1978, vol.2, ch.1) 和 Sassoon (1996, ch.1) 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及愛爾福特綱領之相關討論。

²¹ 見 Bernstein [1899] (1993)。Tudor and Tudor (1988) 收錄了一八九六至一九八一年間修正主義辯論之重要文獻。

來（見 Luxemburg, [1906] 1925）。在「務實改革」（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邊改革邊等待革命」（考茨基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和「促成革命」（盧森堡的行動主義）等立場之間，無疑存在著緊張關係，但第二國際本是一個組織鬆散、意見頗為多元的政治聯盟，其內部路線爭議固然埋下了分裂的種子，但卻不是第二國際之所以在一九一四年瓦解的主因。

早在一九〇七年，第二國際已預料到戰爭即將開打，但各國社會民主人士卻一直未能在民族問題上達成共識。第一次世界大戰雖是意料中事，但戰爭的爆發卻使第二國際在一夕之間全盤瓦解（參見 Kolakowski, 1978, vol.2: 25-30）。包括德國社民黨在內的各國社民黨主流派，紛紛決定向各國政府輸誠，以換取統治當局對工人階級諸多改革訴求之讓步。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國政府也的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讓步，如男性普遍選舉權的確立、通過促進勞動階級權益的各項社會立法等等。從此以後，歐洲社會民主政黨與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也大致拋棄了第二國際時代的國際主義、國際團結理念，而以國家民族利益之捍衛者自居（參見 Sassoon 1996, ch.2）。

當愛國的工人階級和社民黨基層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諸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盧森堡等反戰、反愛國主義份子，紛紛加入從德國社民黨所分裂出來的獨立社會黨（USPD），但政治形勢使得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逐漸淡出政治舞台，而盧森堡則被鎮暴部隊逮捕後謀殺。與此同時，革命成功的列寧開始對碩果僅存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批鬥，痛斥批評他的昔日同志為叛徒或甚至資本主義的走狗。在短短數年間，列寧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另組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列寧主義的時代就此來臨。²²

回顧歷史，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內聚力，最主要來自於對恩格

斯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共同信仰。馬克思所提供之一套看似「科學的」歷史與資本主義發展理論，讓後繼者樂觀地相信資本主義將要滅亡、社會革命終將來臨，因而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伯恩斯坦並未能成功地挑戰此一基本信仰，而考茨基與盧森堡之分歧則可以說是此一基本信仰下的兩種路線之爭。

在經濟思想方面，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接受了馬恩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私有制和市場之基本主張，但也和馬恩一樣，他們並未對革命後的經濟制度進行深入的討論與辯論。相對於汗牛充棟的關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辯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討論卻幾乎可以說是不存在！一個極為特殊的例外是考茨基，他曾經在一九〇二年的〈革命後的第一天〉裡，指出高度複雜的社會分工意味著金錢與市場機制有其繼續存在之客觀現實基礎，而不能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全盤取而代之。²³但遺憾的是，考茨基的論點並未在第二國際內部引起公開辯論。

在政治制度方面，第二國際的代表性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和盧森堡，都不能認同列寧「全面摧毀布爾喬亞民主」之說法與做法。²⁴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本是代議民主制度的堅定支持者，而盧森堡則強調

²² 參見列寧一九一八年之《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收於 Lenin (LCW, 28; LSW, 3)，並摘錄於 Tucker (1975)。另參見 Farber (1990) 論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一系列整肅異己的手段。

²³ 〈革命後的第一天〉收於 Kautsky (1907, pp.103-89)。另參見 Blackburn (1991, pp.185-6)、Selucky (1979, pp.97-8) 及 Szamuely (1974, p.27) 對相關問題的討論。

²⁴ 關於考茨基對列寧主義之著名批判，見 Kautsky [1918] (1919) 和 (1931)，另參見 Salvadori (1979) 對考茨基思想之討論。Pierson (1986, ch.2 & ch.3) 對照了第二國際（伯恩斯坦、考茨基、盧森堡）與列寧主義在民主問題上的一些歧異，對不熟悉一手文獻的讀者來說，這可以當成是一本入門書。

馬克思主義者對自由民主的批判，所批判的是自由民主糖衣下的壓迫和宰制關係，而不是政治自由、多黨選舉、言論與思想自由。早在一九一八年的《俄羅斯革命》文中，盧森堡即預言列寧式的一黨專政無法容納任何真正的政治自由，而終將造成某種官僚專制，只是不曾料想到最後出現的竟是史達林式的恐怖統治（[1918]1961: 77, 71）。

與列寧極為不同的是，絕大多數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並未接受（因為非常難以理解）馬恩的國家終結、政治終結等主張。²⁵ 馬恩關於國家／政治終結的說法，在第二國際時代一直乏人問津，相關的討論可以說是幾乎不存在，直到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出現後情況才有所改觀。

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代表著他與第二國際以及「布爾喬亞民主」的徹底決裂，但值得強調的是，列寧也曾經是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接受了第二國際的許多基本假設。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革命的到來乃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所趨」此項準宗教信仰，此外，列寧亦接受了馬恩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私有制與市場之主張。在這些方面，列寧稱得上是一位典型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

在下一節裡，我將進一步指出，「列寧主義」與「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差異並不在於列寧的黨政實踐理論（革命先鋒隊、民主集中制等等），而在於其對所謂「布爾喬亞民主」的徹底否定。

²⁵ 列寧（LCW, 25, p.401）認為第二國際實已拋棄了馬恩的國家終結及政治終結思想，並對此表示不以為然。至於馬恩的意識型態終結論，在恩格斯之後幾乎可以說是無人問津，參見 Larrain (1983, pp.54-69)。一項常見的誤解是，由於馬克思的較早期著作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經濟與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型態》直到二十世紀才被重新發現，所以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乃至於列寧並不了解馬克思之異化終結論。事實上，「異化及其終結」經常出現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裡，只是不為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

在自由民主問題上，「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立場。這兩種立場都算是對馬恩思想的片面解讀，因為前者不知該如何進步地超越自由民主，而後者則錯把「超越」解讀成「全盤否定」，因而創造出了一種比起當年查禁馬克思思想、讓他不得在大學任教、禁止他入境的威權國家還要危險的專制國家。

六、列寧的政經主張

「列寧主義」泛指列寧所發展出的一套關於如何組織革命政黨、從事革命運動、取得政權之實踐學說，以及他的國家終結、政治終結、直接民主理論。

（一）列寧的黨政實踐理論

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是世上第一個奉行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的現代革命政黨。這種革命先鋒政黨以所謂的「民主集中制」為組織方式，由一群紀律嚴明、政治正確、服從領導、忠貞不二的職業革命份子所組成。在一九〇二年的教戰手冊《怎麼辦？》裡，列寧指出工人階級的自發意識往往為「布爾喬亞意識型態」所污染，因此是不可靠、不能信賴的。在此情況下，他認為一種服膺於科學真理（或所謂「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革命先鋒政黨是有必要的。在「布爾喬亞」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之間，列寧認為並沒有第三種選項，所以凡是不信社會主義的人都受到了布爾喬亞意識型態的污染，都是革命先鋒隊進行思想改造和統戰的對象。²⁶

在第三節裡，我們曾經提到馬克思並沒有一套完整的黨政實踐理論。對馬克思來說，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乃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下的衍生物，而就其本質而言，既不是意識型態也不是科學，而是某種清徹透明的共產意識。²⁷ 這種觀點到了一八八〇、九〇年代已經不容易為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因為第二國際很明顯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科學的世界觀」（恩格斯的用語）的信仰之上，而後者既不是資本主義的自然衍生物，也不是什麼透明的共產意識。²⁸

後來，在考茨基的筆下，黨遂被理解成是某種科學的世界觀（即馬克思主義）的化身，而考茨基也曾經主張黨的任務在於把馬克思主義帶入工人階級。²⁹ 此種對於政黨角色之理解，有其一定的客觀現實基礎，因為儘管第二國際以馬克思主義為共同信仰，但各國工人階級卻未必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在領導者與群眾之間、「科學」與「自發意識」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個有待跨越的鴻溝。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種假科學，因此主張以務實改革為本務；行動主義者盧森堡則主張鼓動大罷工，以激發出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中間派的領導者考茨基則強調黨的教育功能，主張漸近地使工人階級接受馬克思主義，邊改革邊等待革命時機之成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列寧向來以考茨基的學生自居，並強調他的革命實踐理論代表著對考茨基思想的一種發展。但顯而易

²⁶ Lenin (LCW, 5, pp.375-86)。《怎麼辦？》收錄於 Lenin (LCW, 5; LSW, 1) 及 Tucker (1975)。

²⁷ 參見 Marx (MBCW, 5, pp.52-3; MECW, 6, p.487) 論清徹透明的共產意識。

²⁸ 關於恩格斯筆下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世界觀，參見 Balibar (1993, ch.4) 的討論。

²⁹ 對照 Harding (1977, pp.168-70)。

見，考茨基對於黨的教育功能之強調，並不必然導致後人所謂的「列寧主義」，因為考茨基所身處的德國社民黨乃是一種大眾民主政黨，必須與其他政黨從事政治競爭，並以代議民主為基本政治架構。無論如何，在第二國際時代，列寧在俄羅斯的政治實踐尚未形成氣氛，所以並未引起特別的非議，也還稱不上是一種主義。

（二）到列寧主義之路

今日吾人所謂的「列寧主義」之所以變成一種與眾不同的主義，最主要是一九一四年之後的一系列發展所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列寧開始反省第二國際之所以瓦解的原因，從而提出了一套帝國主義理論，然後又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國家與革命》之中，發展出了一套較完整的革命戰略，並明確提出了全面摧毀布爾喬亞國家與民主制度之主張，乃至於有了「列寧主義」的出現。³⁰

列寧相信，由於資本主義在西方先進國家已發展到了盡頭，出現了過度生產、過度積累、利潤率下滑等危機，所以資本不得不向落後國家輸出，從而產生了帝國主義式的殖民和侵略政策。帝國主義從落後地區掠奪而來的暴利，暫時收買了西方工人階級，使得西方國家獲得了暫時的穩定。不過穩定終究是短暫的，因為帝國主義政策以及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將促使革命首先在落後地區發生，然後導致革命在幾個西方國家發生，從而帶動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史達林所不同的是，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與否，必須視革命是否會在西方先進國家發生而定。他相信馬恩所謂私有制與集中化生產之衝突、

³⁰ 著名的列寧思想研究者 Harding (1996) 認為「列寧主義」形成於 1914-17 年間，而不是 1902 年。筆者十分同意此項看法。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衝突，在西方國家已進入了最後階段，而西方國家的生產力亦將為世界革命提供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主張社會主義可以在某個落後國家成長茁壯、最後過渡到共產主義，而這是列寧終其一生所不曾接受的。³¹

在帝國主義理論之外，更值得重視的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所發展出的革命策略和國家理論。在《國家與革命》裡，列寧嘗試對馬克思在〈法國內戰〉文中所提出的直接民主模式進行詮釋，並稱其為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一詞確曾出現在馬克思的著作裡，而「專政」原有「非常」、「緊急」之意，但列寧則將其詮釋成是在革命先鋒隊正確的領導、專政之下的一種直接民主模式。³²為了徹底摧毀布爾喬亞的民主制度與國家機器，列寧認為革命份子必須在舊建制之外另立一個新的權力中心，後者採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或蘇維埃民主）方式，但必須由革命先鋒隊所領導。當革命時機成熟時，革命份子徹底摧毀舊的國家和政治機器，並以此一新的權力中心取而代之。

與絕大多數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同的是，列寧是馬恩國家／政治終結思想的支持者。他指責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視而不見「國家終結」、「政治終結」之於馬恩思想的重要性，因此才會固著於布爾喬亞民主制度，而忘記了馬恩關於此種制度之階級／政治本質的諸

³¹ 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完成於一九一六年，收錄在 Lenin (LCW, 22; LSW, 1) 及 Tucker (1975)。

³² 參見 Draper (1987) 和 Miliband (1983, ch.1) 論「無產階級專政」從馬克思到列寧之發展，以及列寧對馬克思之曲解。十月革命後，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成了名符其實的一黨專政，因此遭到來自 Kautsky [1918] (1919) 的嚴厲批判，而列寧則回敬以《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LCW, 28; LSW, 3)，再度重申共產黨一黨專政之正確性及必要性。

多議論。對列寧而言，馬恩所謂的國家終結、政治終結，意味著必須徹底摧毀布爾喬亞的民主制度與國家機器。此外，他模仿恩格斯的說法，把革命後的新國家理解成是一種不會馬上消失、但「正在消失之中」的國家（LCW, 25: 424）。至於為何如此，列寧和恩格斯一樣，並未能提出任何具體的說法。

在第四節裡，我曾經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主張全盤公有化和計畫性生產的同時，卻未能說明此種公權力將如何消失、是否必須消失、其運作方式及權力制衡機制等等。列寧不但可以說是繼承了馬恩在國家終結／政治終結問題上的盲點，並且還在全盤公有化和計畫性生產之外，增加了徹底摧毀布爾喬亞民主（這是列寧對馬恩「『超越』布爾喬亞民主」的解讀）以及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主張。於是，儘管列寧信誓旦旦地強調直接民主（或所謂蘇維埃民主）要比布爾喬亞民主「更民主一百萬倍」（LSW, 3: 59），但在革命過後的幾個月間，他很快地把權力集中於所謂的「最高蘇維埃」，並以鞏固領導中心、打擊階級敵人、剷除反革命勢力為理由，一步步取消殘存的政治自由與民主成份。³³

在蘇聯共產政權瓦解以前，曾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嘗試為列寧主義進行辯護，以撇清其與史達林和馬列主義之關係。例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某些追隨者認為史達林／馬列主義現象所代表的是對列寧主義的一種「背叛」，正由於列寧所預測的世界革命沒有發生，所以才出現了史達林式的官僚統治。這種說法以沒有發生的事情（世界革命）為列寧主義辯護，彷彿其與史達林主義之間真的不存在任何關聯性。³⁴但事實上，列寧和托洛斯基在革命後所主導的一系列

³³ 參見 Luxemburg [1918] (1961) 和 Farber (1990)。

整肅異己、政治專制的做法，可以說是鋪平了通往史達林的道路。³⁵

史達林除了把列寧式的一黨專政發揮到了極致，還頗為成功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的經濟主張付諸實踐。在內戰過後，列寧開始意識到中央集權的戰時經濟實已滯礙難行，因此同意與龐大的小農階級進行妥協，容許金錢與市場交換的持續存在。但對列寧來說，這是在現實考量下的一種妥協、讓步、或不得已的選擇，而史達林則在掌權以後，使用國家暴力以達成農業集體化的任務。³⁶ 從此以後，共產黨一黨專政以及中央計畫經濟，遂成了馬列主義最基本的政治與經濟主張，以及馬列政權最具特色的政治與經濟特質，並且開始向落後國家輸出。

作為意識型態教條，史達林筆下的「馬列主義」是一種十分庸俗可笑的馬克思主義，其最主要的目的不外乎是從馬恩和列寧的著作裡，剪貼出一套容易記誦的「科學真理」以作為統治工具。³⁷ 恩格

³⁴ 參見 Trotsky [1937] (1970) 和 Deutscher (1967)。另見 Callinicos (1990) 對各種托派 (Trotskyism) 路線之整理討論。在托派陣營裡，還有另一類理解史達林主義的方式，也就是視其為某種國家資本主義，而非某種被官僚所扭曲的社會主義。托派之外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亦經常套用這兩種論述方式，例如向來被歸為毛派的著名哲學家 Althusser (1976; 1979) 即曾經視史達林主義為某種被扭曲的社會主義，但亦有不少毛派論者如 Charles Bettelheim (1976; 1978) 認為蘇聯是某種國家資本主義。這兩種常見的說法基本上皆否認列寧主義乃是促成史達林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³⁵ 參見 Farber (1990)、Harding (1996, ch.10) 和 Blackburn (1991, pp.189-92) 對這段歷史的討論。至於更具理論性的探討，可參見 Walicki (1995, pp.398-425)、Poulantzas (1978, p.255)、Polan (1984) 和 Lane (1981)。列寧在臨終前曾對史達林以及日益膨脹的官僚機器有所批評，但為時已晚，可參見 Lewin (1969) 和 Harding (1981, ch.15) 的相關討論。

³⁶ 另見 Kolakowski (1978, vol.3, ch.1) 的相關討論。

³⁷ 見 Stalin [1924-6] (1940) 論「馬列主義」。

斯的辯證法被條列成諸如「事物皆是相關的」、「運動發展乃事物之本質」、「量變會導致質變」、「凡事皆有正反兩面」等連小學生也（必須）背得出來的「辯證唯物論」（俗稱 Diamat）教條。³⁸此外，史達林的馬列主義還包括了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及諸如「階級已經消失，但階級鬥爭日益激烈」、「國家在消失之前必須先強大到無可復加的地步」等所謂的辯證（=科學）真理。³⁹更值得一提的是，僅管史達林的教條十分荒謬可笑，但在馬列主義傳統裡，他可以說是極少數還算讀過馬恩及列寧著作的政治領袖。

七、代結論：從列寧到馬克思

列寧的共產革命思想廣被認為是促成二十世紀馬列極權政治的要因之一，而我們可以也應該進一步追問：在馬克思的思想裡，是否有些、或有哪些特殊面向，可以視為是促成列寧主義的思想要因？正如我在前言裡所指出的，這是一個牽連甚廣的思想史公案，而本文既非蓋棺論定之作，亦無法全面地探討各項子題，因此僅嘗試初步地釐清問題的主要脈絡和線索，以期發揮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國家終結」、「政治終結」、「全面摧毀布爾喬亞民主」和「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取代市場與私有制」乃是列寧最主要的幾項政經主張。在經濟方面，列寧繼承了馬恩以降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主張，也就是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全盤取代市場與私有制。在政治方

³⁸ 見 Stalin [1938] (1972) 論「辯證與歷史唯物論」。

³⁹ 見 Stalin [1924-26] (1940)，可參見 Kolakowski (1978, vol.3, ch.3 & ch.4) 論馬列主義教條之各種面向。

面，列寧繼承並且發展了馬恩的一些重要堅持，尤其是國家終結、政治終結、超越布爾喬亞民主等主張。除此之外，列寧接受了馬恩以及第二國際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信念，也就是「社會革命的到來乃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大勢所趨」此項準宗教信仰。

職是，馬恩的共產思想稱得上是列寧主義最重要的思想根源，而批評列寧主義、批評列寧，其實也就等於是在對馬恩思想裡與列寧主義最具關聯性的面向進行反思與批評。本文指出，馬恩先入為主地假設了一個私有制、市場、金錢、社會分工已不復存在的共產社會。正由於馬恩把他們的共產烏托邦（私有制、市場、金錢、社會分工之終結）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他們似乎從不認為有必要說明革命後的公有制計畫經濟究竟該如何運作。影響所至，馬恩身後絕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包括列寧在內），無不把焦點放在分析與批判資本主義，而未能嚴肅思考革命後的經濟體制問題。

此外，正由於馬恩先入為主地假設了一個政治終結、國家終結、超越了布爾喬亞民主的後政治社會，所以他們似乎從不認為「公權力該如何行使？如何規範？」、「如何超越自由民主？」是必須嚴肅面對的重要問題。他們在倡議生產工具公有化和計畫性生產的同時，卻幾乎完全存而不論公權力的規範問題，而我認為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思想盲點。在第二國際時代，這個問題尚隱而未顯，因為絕大多數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既未接受馬恩的國家終結、政治終結思想，也不知道該如何進步地超越布爾喬亞民主，更強烈反對列寧「全面摧毀布爾喬亞民主」之主張。然而，十月革命的成功改變了這一切。

列寧不僅以馬恩國家終結、政治終結思想的繼承人自居，還把馬恩「布爾喬亞民主之超越」片面地解讀成是「全面摧毀布爾喬亞民主」，並且順理成章地正當化了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主張。持平而論，

列寧式的一黨專政可以說是馬恩幾乎無法想像、也不可能支持的；再者，如本文所強調的，馬恩主張進步地超越布爾喬亞民主，而不是非理性的全盤否定。但僅管如此，列寧的政治思想毫無疑問是對馬恩國家終結、政治終結、超越布爾喬亞民主等主張的進一步發展，而批評列寧、批評列寧主義其實也就等於是對馬恩在這些方面的議論進行批評。

時至今日，批判列寧主義、批判列寧都不是難事，但我們仍有必要更進一步對列寧主義的思想根源（即馬恩的共產革命思想）提出質疑，因為也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分辨出馬恩思想中的合理與不合理成份。在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已垮台十餘年、中共已走資二十餘年的今天，「馬克思與列寧的思想傳承關係」對許多人來說或許已經不是個有趣的提問，但我認為它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今日，馬克思廣被認為是十九世紀極少數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展趨勢有所認知和預期的思想家之一，而他對於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所造成或助長的社會極化趨勢的批評，也依然是吾人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馬克思除了是資本主義的批判者與分析家外，也是位共產革命思想家。他不僅主張以公有制計畫經濟全盤取代私有制、金錢、市場與社會分工，以及國家與政治的終結；尤其甚者，他堅信此種共產社會的到來乃是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之所趨，也因此先入為主地排除掉了「改革」的可能性。批判馬克思思想中的這些「烏托邦共產主義」面向，並不意味著吾人不必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下的各種不公平不正義進行批判，而意味著吾人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還必須認真思考其各種改革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陳宜中

- 2000 〈再論馬克思的意識型態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7期，頁163-89。

Althusser, L.

- 1976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by G. Lock.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9 "The Crisis of Marxism," in Il Manifesto ed, *Power and Opposi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ies*. London: Ink Link, pp. 225-37.

Avineri, S.

- 1968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libar, E.

- 1993 *Masses, Classes, Ideas*, trans. by J. Swenson. London: Routledge.

Bernstein, E.

- [1899] 1993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ed. and trans. by H. Tud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ttelheim, C.

- 1976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vol. 1, trans. by B. Pearce. Hassocks: Harvester.
- 1978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vol. 2, trans. by B. Pearce. Hassocks: Harvester.

- Blackburn, R.
- 1991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in R. Blackburn ed., *After the Fall*. London: Verso, pp.173-249.
- Callinicos, A.
- 1990 *Trotsky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arver, T.
- 1983 *Marx &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righton: Wheatsheaf.
- 1989 *Friedrich Engels: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Cohen, G. A.
-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 Colletti, L.
- 1972 *From Rousseau to Lenin*, trans. by J. Merrington and J. Whi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5 "Introduction," in K.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 by R. Livingstone and G. Ben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pp.7-56.
- Deutscher, I.
- 1967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aper, H.
- 1987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Marx to Len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Farber, S.
- 1990 *Before Stalinism*. Cambridge: Polity.
- Harding, N.

1977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1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6 *Lenin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Kautsky, K.

[1892] 1971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Norton.

1907 *The Social Revolutio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18] 1919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31 *Bolshevism at a Deadlock*. New York: Rand School Press.

Kolakowski, L.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e, D.

1981 *Leninism: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rraín, J.

1983 *Marxism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enin, V. I.

1964-70 *Collected Works*, in 45 vo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abbr.: LCW).

1967 *Selected Works*, in 3 vo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abbr.:
LSW).

Levin, M.

1989 *Marx, Engels and Liberal Democrac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1969 *Lenin's Last Struggle*. London: Faber & Faber.
- Luxemburg, R.
- [1906] 1925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 Detroit: Marxian Educational Society.
- [1918] 196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cLellan, D. ed.
- 1977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Nally, D.
- 1993 *Against the Market*. London: Verso.
- Marx, K.
- 1973 *Grundrisse*, trans. by M.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abbr.: G).
- 1975 *Early Writings*, trans. by R. Livingstone and G. Ben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abbr.: MEW).
- 1981 *Capital: Volume 3*, trans. by 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abbr.: C3).
- 1994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by J. O'Mal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bbr.: EPW).
- Marx, K. and F. Engels
- 1934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London: Martin Lawrence (abbr.: SC).
- 1969-70 *Selected Works*, in 3 vo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abbr.: MESW).

- 1975-1993 *Collected Works*, in 47 vol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bbr.: MECW).
- Miliband, R.
- 1983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 Moore, S.
- 1993 *Marx Versus Markets*.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C.
- 1986 *Marxist Theo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 Polan, A. J.
- 1984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 Polantzias, N.
-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Rigby, S. H.
- 1992 *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Ryazanov, D.
- 1927 *Marx and Engels*. London.
- Salvadori, M.
- 1979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New Left Books.
- Sassoon, D.
- 1996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London: Fontana Press.
- Selucky, R.
- 1979 *Marxism, Socialism, Freedo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Stalin, J. V.

[1924-6] 1940 *Leni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8] 1972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Stedman Jones, G.

1973 "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New Left Review* 79: 17-36.

1977 "Engels and the Genesis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6: 79-104.

1984 "Some Notes on Marx and the English Labour Movement,"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8: 124-37.

Szamuely, L.

1974 *First Model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s*. Budapest.

Therborn, G.

1976 *Science, Class and Society*. London: New Left Books.

Trotsky, L.

[1937] 1970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Tucker, R. C. ed.

1975 *The Lenin Anth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Tudor, H. and J. M. Tudor eds. and trans.

1988 *Marx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Revisionist Debate 1896-18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icki, A.

1995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d, A. W.

1981 *Karl Marx*. London: Routledge.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aims to examine Marx's communist thought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Lenin's. Marxism-Leninism was a twentieth-century phenomenon entirely foreign to Marx's thought; yet few people today will seriously deny that Marxism-Leninism would have been totally inconceivable without Lenin. The question then arises as 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arx's and Lenin's communist thought. The present essay argues that there are strong connections between Marx and Lenin. That is to say, for a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 and Lenin, Leninism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without Marx's terrible blindspots about state power,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society. In retrospect, to criticize Lenin and Leninism is to criticize the inadequacies and errors in what Marx had to say about these matters.

Keywords: Marx, Lenin, the State, Capitalism, Communism

